

顾晓鸣著

# 现代人寻找丢失的草帽

● 对文化与  
文艺在通观行  
程中的发现

●对文化与文艺在通观行程中的发现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 现代人寻找丢失的草帽

——对文化与文艺在通观行程中的发现

380819



## **现代人寻找丢失的草帽**

顾晓鸣著

责任编辑：张自文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7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 插页：2 字数：180,000

印数：1 —— 12,700

ISBN7—5404—0070—6/I·66

---

统一书号：10456·245 定价：1.95元

不管事实是物理的还是精神的，它们全都有它们的原因。……每一复杂的现象都来源于它所依靠的另一更简单的现象。那么就让我们象寻求物理特性的简单现象那样去寻求精神特性的简单现象吧！

——丹纳

# 目 录

序 文化·社会·文艺：在通观行程中发现……………（1）

**第一编 文化与人**……………（5）

人是文化的动物。

现代人不满足于看别人表演和比赛，而要求自己参与比赛，自己演奏表演，  
自己……

人嘛，直立行走的高等动物。当然是立体的。

于是，在理性的文字中间，我播散着对人和社会的点滴断想……

纹花——文化的通观（5） 文化研究中的悖论（13）

心、言、文：语文的文化学视野（21） 修辞文化通观（26）

创造作为整体的中国现代文化（32） 文化休克（34） 文  
艺评论的文化学视野（37） 社会化、时间和历史（42） 两  
难境地及其他（45） 对中国文化特征的再认识（49） 电视  
竞技节目和群众的文化主体性（55） 唐人街中国文化风味  
(59) 从女儿盼望“老公公”谈起（61） 人在文化中的主体  
性问题(65) 生与死(67) 立体的人(71) 人以时分(74)  
角色距离的分析(77) 人与人：实践的动态关系(81) 街  
角少年和大院成人(85) 残废人的“生命的权利”(88)

**第二编 社会与文艺**……………（93）

人以群分，文艺也会以群分。

人们天天生活在委琐平凡之中，这就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想超越平凡场景，

体验生活中难以感受的激情的愿望。

干嘛不在初夏的时候就想着：下一个口袋会开在哪里呢？

社会学能为文艺开辟新的视野 (93) 文艺社会学与社会学视野中的文艺 (96) 寻找母题(104) 曲旧和寡：影视作品和观众的人生经验(107) 身内优缺点身外找原因(109) 影视与梦幻工厂(111) 在流行音乐热之类的后面(114) 演员间的交互感应(116) 随便使用替音演员，这很不好(117) 屏幕之外(119) 编导，小心不要跑到台前来(121) 戏剧在寻找英雄汉(123) 亲切点，亲切点，再亲切点(126) 电视剧比照戏曲：能开一条新路吗(127) 电视剧需要“迎合观众”(131) 突出“讲话”因素，电视寻找自我(135) 人在视线内，人在心头中(138) 漫画还要更“漫”些(140) 流行歌曲，到戏曲中去汲取灵感(142) 马后炮评论和评论的先导性(144) 文学作品：虚拟的现实和实在的现实(145) 流行·时髦·新潮：小心黑皮夹克效应(148) 下一个口袋开在哪里？艺术创新心态的追索(151)

### 第三编 失落与寻找.....(157)

她想丢去被强行扭曲过的自我，却丢失了自己真正的自我。

.....

现代人的文艺，正在丢失一些什么，寻找一些什么？丢得掉吗，寻得到吗？我回答你们的，只能是这样的一些例证——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人证》(157) 《血疑》(163) 《父女之间》(167) 《新星》(169) 《第二梯队开始行动》(172) 《珍妮的肖像》(174) 《格洛莉娅》《灰阑记》(176) 《茜嫂的盒饭店》(178) 《彩色的问号》(180) 《机组乘务员》(181)

《W·M》(183) 《故土》(186) 《在水一方》(187) 《少年犯》  
(190) 《秋天里的春天》(191) 《诽谤》(193) 《瓜园曲》  
(195) 《潘金莲》(196) 《血的迷路》(198) 《阿信》(200)  
《女刑侦队长》(202) 《失踪的女中学生》(204) 《浪花之恋》  
《蒲田进行曲》(209) 《第七个目标》(213) 《天才与疯子》  
(215) 《月朦胧，鸟朦胧》(218) 《W的悲剧》(220) 《橄榄》  
(222) 《三寸金莲》(226) 《卡门》(229) 谢晋(231) 琼瑶  
(236) 《假如……》(242)

# 序

## 文化·社会·文艺·在通观行程中发现

我敢说，当代最不起眼然而却是最重要的词汇是：发现。“你发现了什么”，这一句简单的问语一旦成为判断人生、艺术、科学的标准，会使我们自己多么地自惭。小至穿一件什么颜色款式的衣服、学习一件什么样的技艺学问，都是以我们是否发现“时髦”和“学问”、是否发现“自我”为前提的。成万上亿的服装样式和书籍知识中，究竟哪些真是时髦和学问？究竟哪些与我们自身相结合，能从此为人类增添一样新的时髦，一点新的学问？人生成为发现的过程，我们正是随着时间的流程，在生命的体验中，发现周围的世界，发现自然；发现人们会笑会哭会有那些极微妙极深邃的社会表情……爱人和爱情是靠我们的发现而获得的，连父母兄弟姐妹子女之情也是如此……整个世界，无论是自然界还是社会界，固然先于我们已经存在，但只有在我们的生活过程中，才真正发现它们那富有永恒哲学意味和对自己现实意义的存在——没有发现的生命算是白活了一世，你有发现的慧眼，也许你比常人多活了几个人生！

艺术，那是什么？那正是具有发现的慧眼的人们，在常人熟视无睹的世界中，透视出用美、意义、价值构成的另一重世界，

并用文字音符、图像色彩这些文化的标记固定下来，以其特有的文化的存在——极端的形式便是对另一种文化的人们来说是天书一般的“文学”，把这一重文化的世界变成人类创造的现实和人类的集体记忆，代代相传，万世不竭。每一代人出生的时候，就完全不是象动物那样只面对一个由自然和自己肉体所组成的世界，而是面临着一个自然和人类文化交织在一起的、有美、有意义、有价值的世界！每一代人以文化的形式，承继了上一代人的“发现眼光”，于是，我们眼下的这些人，在青少年时就知道水是由氢和氧组成的，并知道如何从电影“杂乱”的蒙太奇中正确地领悟现实的世界！

然而，新一代在有幸享用上辈人的发现的时候，都面临着世代的责任：我们发现了什么？对个人来说，问题更加严峻：先人们流传给我这么多的发现和发现的能力，我又在多大的程度上重新发现了他们的发现，并用他们创造的能力，有一重新的发现？

于是，艺术的形式、手法等等，变得愈来愈次要，艺术家的使命，艺术品的涵义和价值集中在：你发现了什么？而艺术鉴赏，没必要纠缠在细枝末节的渊博知识上，鉴赏水准的高低竟只在于这样一点：你发现了什么？

让我们到美术馆去、到音乐厅去，到文学家作曲家的斗室中去……你会看到那些身手不凡的艺术家们付与全身心的努力的是：发现。无论是孜孜于先人的艺术样式，无论是深掘着特殊的人生体验，无论是乞求于灵感的偶发，无论是沉浸在哲理的思考——二十世纪的艺术家们不约而同地试图在那些用熟了用烂了的词语、音符、图形中，构建自己对世界独特的理解，在自己的作品中发现自我和创造自我，而在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不约而同地又把目光指向科学，尤其社会学科学！

因为正是社会，构成了文艺和文化活动的对象和环境，文艺和文化品的描写对象、服务对象和存在形式（一切艺术品的存在以社会性的观听众的存在为前提），于是无论对文艺创作还是文艺鉴赏，发现的焦点就在于对社会和人的洞察、理解和感悟！

然而，社会就在这里，需要的是一双眼睛；并非任何身在社会的人都能“看”到社会的。因此，利用社会科学尤其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视野，来开掘一重新的文艺经验，无论对于艺术家还是对于鉴赏者的发现，会助上一臂之力。

悖论倒在于：开掘这一重由社会学视野而获得的新文艺经验的人，你自己有多少新的发现呢？确是如此，这也许是文艺和科学、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关系史上永远解决不了的方法论问题——究竟是依靠对生活的直觉体验而创造的文学艺术家们先发现新的东西，还是有关的文艺批评家和理论家更高明一些呢？我想没必要寻求绝对的结论，发现总是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的社会性的发现，文艺家的发现和理论家的发现是不可分割的社会互动，正是在相互吸收和批评的相互作用中达到我们这一代人的新的发现！

于是，文艺社会学也罢，社会学视野中的文艺也罢，既不可能产生于从现成理论出发的演绎，也不可能以马后炮的方式为文艺家的创作诠释图解，而是需要寻找一种研究和写作的特殊方法论——如何概括呢？我想到了法国诗人和文艺理论家瓦莱利（1871—1945）一段隽永的话：

“走路，象散文一样，有一个明确的目的。这个行为的目标是我们所希望达到的某处地方。实际的状况，例如对某一物体的需要，我的愿望的冲动，我的身体状况，我的视力，以及地形等，都影响走路的方式，决定了走路的方向与速度，使走路有一个明确

的目的。走路的一切特点都是由这些瞬间的状况而来的，这些瞬间的状况每次都以新的方式组合。走路的所有动作都是特殊的适应，而到达目的地后，这些动作都被废除了，仿佛被行为的完成所吸收了似的。”

文艺评论的“走路”还要更复杂一些，因为，评论的对象是另一个也在这样走路的人；社会学视野的文艺评论，更还有社会学理论自身“走路”的问题。因此，这本书中收集的文章是以特殊的方法论，在文艺发展和社会学发展的双重动态过程中写成的——我带着发现的明确目的，紧紧追随和把握这动态的瞬间，以特殊的适应，以新的方式组合，借鉴和试图超越艺术家和社会科学家的创造，希望在生活的“走路”过程中，达到发现，走向目前还依稀可辨然而又如此富有挑战性的目的地。

不要理会这些文章中包含的细小的“动作”，亲爱的读者，我正依靠你们的热情和慧眼，来显现和发现在这文艺和社会学相互观照过程中真正导向目的地的轨迹！

这轨迹，是一种文艺、文化和社会的通观，一种依靠这种特殊的知识综合、鉴赏视角和分析方法论的“自我”。少年的我，曾深深眷恋于诗、文学、油画、篆刻、戏剧创作表演和导演、电影的鉴赏和分析，青壮年的我，却陷于社会科学的理性和社会生活的实践，近二十年的时间竟无暇身体力行美和艺术的创造，自去年被邀请担任第三届上海戏剧节评委以来，忽然在新的人生历程中发生了少年经验和壮年经验的奇妙撞击和组合，于是，一大批文章如瀑布般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涌泻出来——也许正是在我特有的人生经验的综合之中，形成了文艺和社会学的某种通观，我就在这由近百步“脚步”组成的行程中，可能寻到我那曾经丢失的“草帽”。

一九八七年元月

# 第一编 文化与人

人是文化的动物。

现代人不满足于看别人表演和比赛，而要求自己参与比赛，自己演奏表演，自己……

人嘛，直立行走的高等动物，当然是立体的。

于是，在理性的文字中间，我播散着对人和社会的点滴断想

.....

## 纹 花

——文化的通观

文化是什么？正如《大英百科全书》关于文化的条目所说的：“本百科全书实质上就是对文明的叙述。因为它的内容是描述人类在复杂迷离的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它显示人类在数十万年间获得的关于他们自己，关于世界和与人类共同享有这个世界的生物的知识。”对“文化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探索，本身便是文化。如果我们把世界范围从古到今所有对于文化和文化现象的叙述、概括、定义都罗列和连贯起来，那么，可以说，它就是文化史的本身——人之为人，人之区别于动物，恰恰就在于这样一种双重的自觉：一方面，认识到自己的存在；一方面，又同时认识到自己

创造物的存在。当人们试图用某种形式把自己的存在和活动（过去的活动和未来想往的活动），把自己存在的各种要素——感情、感觉、意志以及耳闻目睹的一切，表达出来的时候，当人们试图寻找自己的存在和活动与自己周围自然界的关联，并加以表述的时候，文化就萌发了。这最原始的文化同样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是人日益自觉的存在和活动的过程和痕迹；一方面是对这存在和活动及其过程和痕迹的表达和表述。说来不是巧合，“文化”这个概念的西方词源和中国词源，正好分别表达了这一双重含义。

“文化”的西方词源是拉丁文“*cultura*”，英文中的*culture*即来自于此。众所周知，*culture*有“文化、培养、栽种、耕种”等含义，可以用于十分抽象的“教养”和“修养”等方面，也可以用于十分具体的“细菌培养”之类，分析一下这跨度甚大的语义，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核心意义，这就是，文化是与人类纯粹的动物遗传性相对应而由后天获得的一切。希腊式或中国式的鼻子是靠遗传获得的，而希腊语言和礼节则要靠后天的“*culture*”。把这层意思从个人移向整个人类社会，那么，相对于自然而而言的人造的一切，都是文化。人的文化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当第一块石头被敲打成某种“好使”的模样时，“文化品”就诞生了，尽管在后人看来，这种最原始的工具同大自然偶然爆裂的石块几乎毫无区别。这里发生了什么呢？深入的思考会向我们揭示：使“非文化品”转化为“文化品”的关键，在于人从自己生存和活动出发，利用之、改造之，赋予其特定的“人的意义”。举个极端的例子：野生动物保护园，也许人类丝毫也没有改变其中的一草一木，但一旦赋予这片存在了亿万年的原始森林以这样一个意义的时候，它就与其说是自然区域，还不如说是文化区域了。由此想来，对动物的驯养、植物的栽培（乃至野生植物的利用）不是同

人类文化的开端同时发生的吗？至于往后日益发达而繁复的科技工艺，它们的“人造性”是不待说的了，然而，从抽象的思辨的角度加以归纳，这一切也无非是按照人的生存和活动的方式，把自然之物重新摆布一下而已，其核心问题仍在于它们对人的存在和活动所具有的意义（用途也是意义）。

因此，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在双重意义上体现为文化的发展：一方面是文化品的发展；一方面是文化意义的发展。一切文化品必须同相应的文化意义相结合，它们对人的存在和活动才有价值——一台最高级的计算机，对于不懂其意义（用途、用法、有关知识等等）的人来说，等于一堆废物。因此，文化品在人际和代际的传播，必然同时伴随着意义的传播。换成抽象的思辨的语言，那就是，文化品既然是与自然相对应的人造的后天之物，那么，它的传播必不能依靠人类先天的“动物性的遗传”，而要依靠一种非自然的人的“身外之物”，要靠一种后天的传播系统和传播机制，才能在不同人群的人们之间，在不同世代的人们之间“遗传”、“突变”和“进化”。

这样，人在使用工具和用工具制造一切人造的“文化品”的同时，必然产生一种在“学文化”意义上的“文化系统”。这正好是“文化”的另一重含义。德国文化哲学家卡西尔在名著《人论》里，把人定义为“（象征）符号的动物”，也即能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而这种“符号”是同人的“劳作”联系在一起的。“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我们必须深入到这些活动的无数形态和表现之后去寻找的，正是言语、神话、艺术、宗教的这种基本功能。……我们必须力图追溯到一个共同的起源。”卡西尔把人、人

的活动、符号、文化作为统一的整体来加以考虑，正是体现了对“文化活动”、“文化品”和狭义“文化”相互关联的深刻认识。

因此，文化概念的另一重含义就是“纹花”（象征符号），而这一层意义恰恰又是“文化”的中国词源意义。“文”，最早的意义就是“纹”，纹身之纹，或花纹之纹。以“纹”为本义来引申出“文化”概念，在世界其他民族中是绝无仅有的。《说文》说：“文，错画也；象交文。”这种“交文”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几乎扩及所有层面的“象征符号”。《周礼·考工记》说：“青与赤谓之文”，《礼记·乐记》说：“五色成文而不乱”，《国语·晋语》说：“言，身之文也”，《鲁语》说：“服，心之文也”，《左传》说：“动作有文”……等等，正是把颜色、语言、动作、服饰等人的各种方面作为具有文化意味的“纹花”来加以认识，并把“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作为一种最高的人的规范。从另一个角度看，上古伏羲氏观象于天，取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创作八卦，作为中国文化的开端，在世界各民族中也有其显著的特点。借用前面的抽象概括，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在一切人造的“文化品”发生之初，就自觉到“纹花”的存在，并有意识地进行“纹花”（小文化）的创造——八卦、文字、河图洛书等等。《文心雕龙》所说：“人文之元，肇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从文化学的视野来看，毫不神秘可言，倒反衬托出我们先人对文化现象的重视和领悟。

“文化”概念在西文和中文中的词语意义，之所以如此巧合地反映了文化概念的主要的两个方面，原因是：在近代文化科学产生之前，人们已经朦胧地感受到文化问题的存在，并一直在用各种方式把它反映出来。因此，要回答“文化是什么”的问题，必须追溯以往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而这种追溯不能起自近代的某位西方学者，而应囊括人类整个历史经验和文化经验——对文

化的思考和文化同样的古老。

但是，作为科学概念的“文化”毕竟是从近代开始的，至今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迄今为止已有几百个有影响的文化定义，作为人人都能意会的文化现象，竟然由于“科学概念”太多，反而越弄越糊涂了。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文化是属于那种“你不说我还清楚，你愈说愈糊涂”一类的概念。因此，如何抓住要领，以简驭繁，也成为文化研究和认识文化问题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了。

顺着两个词源意义所揭示的方向，从这一组双重性的内涵来反思近代关于“文化”的观点，也许能有高屋建瓴之一得吧。

近代文化研究伴随着生物进化论的研究而诞生，这并非偶然。人对“文化”的认识，是在区别生物的遗传性和人工的习得性过程中逐渐发展的。

和达尔文同时代、并相互启发进化思想的斯宾塞（1820—1903）是著名的进化论和有机体论的社会学者，是近代文化研究的先驱者。他在把社会机体类比于生物机体的同时，特别指出了社会不同于生物机体的“超机体”的特征。与达尔文关于人类进化著作发表几乎同时的英国人类学家泰勒（1832—1917），同样持进化论的观点，他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中提出了“文化”的经典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

带有进化论倾向的文化人类学成为近代文化科学的主要基础，它具有以下的特点，有关学者或侧重于某一特点，展现了文化理论的细微分野。

（1）类似物种调查那样对原始文化的实地调查。摩尔根（1818

—1881)、韦斯特马克(1862—1939)等民族学家对婚姻和家庭史的研究，事实上是通过对原始文化事实的分析，试图解决作为生物的人与作为社会的人的衔接问题，也即文化和文明的基础和发生的问题。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拉德克利夫—布朗(1881—1955)、博厄斯(1858—1942)、克罗伯(1876—1960)等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则以实地文化资料为基础，试图提出对文化结构的理论解释。而象涂尔干(1858—1917)、莫斯(1872—1950)、莱维—布吕尔(1857—1939)等法国的社会学—人类学者，则利用别人的或自己的文化实地调查资料，提出一系列更深入的文化学理论，如涂尔干的“集体表象”，莫斯的“互酬性”、莱维—布吕尔的“原始思维互渗律”等等。文化人类学的这种研究文化的方针继续为许多当代知名的文化学者所发扬光大。写作《菊花与刀》、《文化型式》的本尼迪克特，对波利尼西亚群岛的提科皮亚人、新西兰的毛利人等进行系统调查研究的弗思以及和克罗伯一起撰写《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判性回顾》一书的克鲁柯亨，基本上继承和发展了上述文化人类学的传统，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

(2) 在深入探究人类“有机体”与生物有机体的区别过程中，逐步提出了文化中的象征符号系统的问题，并逐步深入到这些象征符号的深层结构问题。早在文化科学出现之初，社会学中有机论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德国社会学家谢夫莱(1831—1903)就提出：社会乃是“诸有机个体产生在纯心理活动基础上的不可分开的居住地，符号就是纯心理活动的外部表现，它表达思想和技术活动，创造效益并物化为人的思想产物的外部客体”。当代著名的新进化论文化人类学家怀特，就是以象征符号为中心来建立自己的文化理论的。(“象征”和“符号”是同一个英文——symbol的